

“互联网+”时代需要“监管+”

赵志疆

今日论语

今年央视3·15晚会曝光了网络订餐平台“饿了么”惊现黑心作坊后,“饿了么”连夜回应:诚恳接受媒体及社会各界的引导和监督,百倍努力,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用户体验。然而,负面新闻依旧接踵而至——

3月26日,江苏一对年轻情侣在“饿了么”下单订餐,因为饭菜质量不好给了店家差评,没想到店主不仅出言威胁,还上门砸坏了他们的房门。就在同一天,成都大学生小杨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,因为一个差评防盗门被人砸坏。紧接着,北京媒体连续报道“饿了么”合作商家涉嫌无照经营、相互盗用后厨

照片,有些类似黑作坊。

“点餐有风险,差评需谨慎”之类揶揄之声此起彼伏,一时之间,“饿了么”成了众矢之的。这家国内最大的订餐网站,正面临着巨大的信任危机。每次负面传闻出现,“饿了么”都会第一时间将涉事商家下线,但不良商家似有“剪不断理还乱”之势,乃至使“饿了么”疲于应对。这样的尴尬,固然可以归结为合作商家数量太多,但也未尝不是“饿了么”疏于监管酿成的苦果——如果当初能做好准入把关、加强日常监管,何至于陷入如今的尴尬局面?

从交大校园到上海市内,最终扩张到全国,“饿了么”的成功堪称互联网创业教科书。幸福总是来得太突然,从四处跑市场、发

传单,到坐拥数十万家餐饮商户,“饿了么”只用了短短数年时间,但在急剧扩张的同时,“泥沙俱下”的粗放式管理弊端正在逐渐显现,“饿了么”也因此陷入“成长的烦恼”。面对负面缠身的“饿了么”,当然没必要一棍子打死,不过,“饿了么”正在经历的一切,足以令后来者引以为戒:借助“互联网+”的春风,互联网产业正在迎来最好的时代,但在“跑马圈地”的过程中,如果不能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理智,很有可能为日后进一步发展埋下隐患。

作为“饿了么”的诞生地,当“饿了么”陷入信任危机的时候,上海格外引人关注。令人欣慰的是,上海暂时没有发现类似问题,而这显然要归功于严格的市场管

理体系。日前,《上海市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(征求意见稿)》刚刚结束意见征求。根据新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,上海颁发了全国第一张“专业网络订餐许可证”,相比起电商平台的自我监管,许可证准入制度不仅便于实施源头管控,而且更容易实现对口监督、责任到人。

身处“互联网+”时代,公众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在发生巨大变化,市场秩序也因此面临巨大考验。确保公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,不仅需要互联网企业加强自我管理,同时需要职能部门完善市场监管,只有线上线下齐发力达成“监管+”,才能在维护公众利益的同时,促进网络订餐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新民随笔

下一站烟

吴强

一个多月前,有感于春节烟花爆竹治理成效显著,写“烟花易冷”——表达欣喜,其实更多春秋笔法表达隐忧。这是“易”的,“难”在别处。“易”的做好了,且慢欢喜;“难”的能做什么,心存犹疑。

当时列举两个“难”:
“我们周围还有一些陋习,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,要想365天,天天都改观、都根治,难度要大得多,比如闯红灯交通法规的乱开车、乱停车,再比如公共场所旁若无人、喷云吐雾的香烟瘾君子等。”

然后,文章结尾说“烟花易冷,且待续集”。没想到,续集那么快就来了。

我当然知道——就像日出不是鸡叫出来的一样——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,是上海当家人深切认识到交通短板,下定决心治理的结果,是对社会持续呼声、改善民生诉求的切实回应。决心既定、手段跟上,真抓、真管、真禁止,也就真出效果。前两天,市长做客媒体时还透露,大量电子监控设施正在驰援。

真抓是有效的。不少朋友已经在感慨:交通状况有很大好转。记得数年前,喝两口酒开车满不在乎的,还不在于少数;真抓了,喝酒不开车、开车不喝酒,已经变成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和准则了。

自然而然,就想到另一个“难”:禁烟难。规章制度也不是没有,改善也不是没有,但还是经常不如人意。餐馆里堂而皇之抽烟者有之,餐厅也不敢理直气壮管理;地铁站厅明令禁烟,还没出站者堂而皇之抽烟者有之,人流密集,地铁也很难管过来;还有说不上台面的,洗手间里,以此气味对彼气味堂而皇之抽烟者有之,活生生把一个洗手间变成毒气间。

是不是比交通违法行为更难?因为交通违法行为,好歹都发生在路面上,即便不能说都是光天化日之下,好歹车子标的总是显而易见的,车子牌照总是容易露出马脚的。吸烟,就更难了,更私人化、更容易抵赖、更容易溜之大吉。

但吸烟的危害,某种程度上说,恐怕并不亚于交通违法行为。这,已经无须赘言了。所以,看到交通违法行为整治的雷厉风行,忍不住就期望着:

下一站烟。

关键是“能下”,难点是“真下”

权威声音

“能下”问题的重中之重。

实现干部能上能下,难点是“真下”。过去干部能上不能下,原因不仅在于“下”的情形不明确、管道不畅通,更在于“下”的执行力度不够大。比如干部问责制,在问责中被免职的干部往往被“高高拎起、轻轻放下”,沉寂三五月旋即恢复同等级别工作。社会公众关心干部“能下”,关心的不是设定什么比例、指标,也不是季末年底的统计数据,而是有没有制度化的可实现路径,到底都是谁实现了“真下”。

实现干部“能下”“真下”,不是为了惩戒处分、排斥打击哪个干部,而是要建立优胜劣汰、奖优罚劣、激发全体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的新机制。推动干部能“下”,也应完善“能下”之后的管理机制,对调整下来的干部跟踪了解思想状况和工作状态,对能力不足的强化培训,对存在困难的帮助解决,对存在问题的提醒教育。让干部“下”得服气服众,让干部群体受到激励触动,才能起到激浊扬清、振奋干劲的重要作用。(李斌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新民新语

智商优越感

马丹

我想,这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类的智商差不多是一个水平线上的,不过,不少人都都会认为自己是人群中比较聪明的。平时,你只需稍稍留心,就会发现现在社会里除了金钱成功论甚嚣尘上外,爱秀智商优越感成了另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。“这个我知道。”“你怎么这也懂?”有智力优越感的人,总爱通过有意或无意地炫耀“学识渊博”来贬低别人抬高自己。就比如,看美剧英剧的瞧不起看韩剧台剧国产剧的,非要觉得自己智商高,认定其他人是“脑残”;理科生看不上文科生,随便扔一个虫洞理论或薛定谔定律,就能随意“碾压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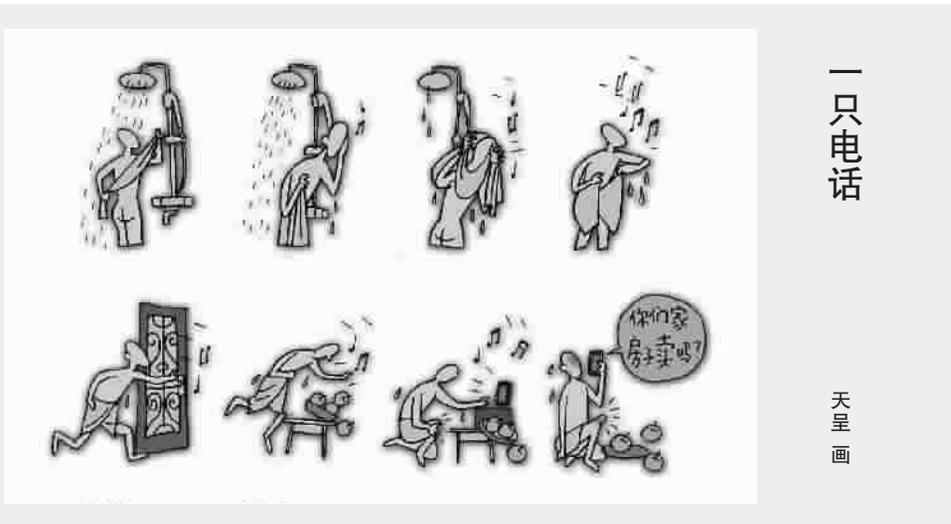
网红写手“和某某”写了一篇疫苗事件的文章,认为只有文盲才会用“殇”,被群起而攻之。或许,他的本意是好的,提醒公众遇上公共事件时不要被情绪宣泄所绑架,尽量越过愤怒去思考。然而,他自以为是的智商优越感来不及刹车,就变成了对公众智商的一场赤裸裸的宣战,直接撞上了被“二次心理创伤”后的众怒。

其实,智商“鄙视链”倒非时髦事,钱锺书先生就曾在《围城》里这样描述过:“在大学里,理科学系瞧不起文科生,外国语文学系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,中国文学系瞧不起哲学系学生……”只不过,鄙视链鄙视,好好说话还是需要的:一来,会背百科全书的学者未必就真的比经验丰富的养猪老农智商更高,或许只是比老农有更多读书深造的机会;二来,知识传播和论点表达,为何一定要盛气凌人?

“和某某”倒也提醒了我,作为一个媒体人,浸染在某个领域多年,对某领域的理解之深之广是有可能超过普通从业者,因此很容易产生智商上错误的优越感,也很容易在向公众表达的过程中选择一种“居高临下”的方式。正面的例子也有,一部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的纪录片很火,不同于以往的纪录片爱“掉书袋”或宏大叙事,这部纪录片镜头里的画面朴素,但正是这种平易近人的白描式的叙述,让人更易接受,好好讲了一场“故宫”的故事。

去年7月,中央印发《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(试行)》。截至目前已有至少12个省份出台了实施细则或实施意见。

实现干部能上能下,关键是“能下”,症结点在于不能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。对那些“没有大过、没有严重违纪违法”,但在其位不谋其政、能力素质不适应”的干部,如何调整、如何对待,是解决干部



自由谭

日前,江苏省苏州市首个以乡贤文化为主题、具有社会治理功能的“乡贤议事厅”揭牌。成立“乡贤议事厅”,是为了发现和挖掘村居的乡贤资源和潜在人物,扩大“老娘舅”志愿服务团队的影响力和作用力,动员他们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参与各种社区事务、村居自治活动、建言村居发展。

“生于其乡,而众人共称其贤者,是为乡贤。”乡贤曾淡出历史,如今逐渐升温。前不久,全国人大代表、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建议,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,应鼓励官员、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“告老还乡”,实现人才从乡村流出到返回的良性循环。

一说到乡贤,但凡读过《白鹿

原》的人,或许想到朱先生。他是白鹿原的精神领袖,饱学砥行,德高望重。他鼓励村民多读书,“不读圣贤书,只知点蜡烧香,怕是越磕头越昏了”;他拟就《乡约》,“德业相劝、过失相规、礼俗相交”;白鹿原大旱,他受邀担任赈灾副总监时,慨然击掌:“书院以外,啼饥号寒,阡陌之上,饥民如蚁,我也难以平心静气伏案执笔;我一生不堪重任,无甚作为,虚有其名矣!当此生灵毁灭之际,能予本县民人递送一口救命饭食,也算做了一件实事,平生之愿足矣!”据《白鹿原》作者陈忠实先生介绍,朱先生并非凭空虚构的人物,其现实原型是清末民初誉满三秦的名

也说乡贤

秦淮川

犒牛兆濂。劝退八旗军、赈灾济民、通电抗日、主持禁烟、规劝军阀等事迹,都发生在牛兆濂身上。

千百年来,在中国乡村,无论建制立规还是定纷止争,无论淳化风气还是改善民生,历代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均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对于一些后生来说,本乡前贤还具有精神感召之效。据《宋史·文天祥列传》记载,文天祥自为童子时,见学官所祠乡先生欧阳修、杨邦义、胡铨像,皆谥“忠”,即欣然慕之,曰:“没不俎豆其间,非夫也。”小小年纪,文天祥即发誓,如果死后不置身于那些受后人祭祀的忠臣之间,就不是大丈夫。到他后来“留取

丹心照汗青”,很难说受乡贤精神所感染和激励。

由乡贤而衍生的乡贤文化,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特别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,乡贤文化根植乡土,葳蕤多态,有形无形地支配着乡村成长。当然,受时代局限,传统的乡贤文化有其弊端,比如过于强调人治,所捍卫的乡村秩序也需要推敲。但总体上看,如果推陈出新,趋利避害,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值得传承。

今天提倡乡贤文化,并非复制过去。按照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所附带的解释材料可知,“(要)借助传统的‘乡贤文化’形式,赋予新的时代内涵,以乡情为纽带,以优秀基层干部、道德模范、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,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”。这意味着在建设新农村的今天,建设新乡贤文化有空间,也有必要。